

解读金陵女大:文化资本的视角

任新星

摘要:金陵女大作为一所教会女子大学,开创了中国近代女子高等教育之先河。从布尔迪厄文化资本理论的视角出发,解读金陵女大的具体文化资本、客体文化资本以及体制文化资本,发现文化资本在金陵女大发展过程中产生着重要影响,对于当下高校面对传统与外来的关系、生产有特色的文化产品、女子大学的重提与发展等都具有一定的启示与借鉴意义。

关键词:金陵女大;具体文化资本;客体文化资本;体制文化资本

DOI 编码: 10.3969/j.issn.1007-3698.2013.03.017

收稿日期: 2013-03-23

中图分类号: D44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3698(2013)03-0095-05

作者简介:任新星,女,曲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历史与比较研究。273165

金陵女大全称金陵女子大学,又称金女大,创始于1913年,1915年9月正式开课,1930年更名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金女大创建于动乱年代,历经沧桑,却仍然顽强地生存下来,不仅开创了中国近代女子高等教育之先河,更发展成为我国“近代教育史上影响最大、办学最具特色,并在国内外享有很高声誉的教会女子大学”。^[1]针对金女大的发展,学者们多从其办学特色、人才培养模式、就业能力等方面进行探讨,运用理论体系进行分析的学术成果尚不多见。本文引入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文化资本为理论视角,剖析金女大的创建与发展,希冀为我国高校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文化资本即个体在教育场域中通过对惯习的塑造而形成的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可以帮助个体在场域中争夺或巩固优势位置,从而获得对场域的控制权,主导场域的发展方向。它有三种存在形式:“(1)具体的状态,以精神和身体的持久‘性情’的形式;(2)客观的状态,以文化商品的形式(图片、书籍、词典、工具、机器等等),这些商品是理论留下的痕迹或理论的具体显现,或是对这些理论、问题的批判,等等;(3)体制的状态,以一种客观化的形式,这一形式必须被区别对待(就像我们在教育资格中

观察到的那样),因为这种形式赋予文化资本一种完全是原始性的财产,而文化资本正是受到了这笔财产的庇护。”^{[2]192-193}依据以上表述,我们将这三种形式分别称作具体文化资本、客体文化资本、体制文化资本。

一、金陵女大的具体文化资本

具体文化资本是一种持久的精神,它蕴藏于个体(或组织)之中并随着个体(或组织)的衰落而消亡。正如布尔迪厄所说:“这一过程因为包含了劳动力的变化和同化,所以极费时间,而且必须由投资者亲历亲为,就像肌肉发达的体格或被太阳晒黑的皮肤,不能通过他人的锻炼来获得那样。”^{[2]194}因此,金女大具体的文化资本体现在其创建与发展的过程中,即将外部知识融入内部组织的过程。由于金女大是一所教会大学,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并在学校中形成以校长为中心的教授治校管理模式,故而校长作为她的代言人,其自身渊博的学识与文化涵养、对学校办学宗旨和未来发展方向的准确把握以及良好的管理能力对金女大的发展都至关重要。

1913年,德本康夫人(Lawrence Thurston)出任

金女大首任校长。德本康夫人毕业于美国蒙特霍利女子学院(Mt. Holyoke College),曾担任美国东部大学学生志愿运动团秘书,与美国教会大学有广泛的联系,后被派往中国长沙湘雅医学院教书并协助医院工作。其良好的学术背景、丰富的教学经验及与美国教会大学的密切关系使她赢得了董事会的信任,并寄予厚望。在金女大创办之初,德本康夫人遵循外国基督教教会在中国设立女子高等教育的初衷,指出学校的办学宗旨是:“为伸展基督教在中国的影响缘故,……提供领袖训练,教育基督徒妇女,以装备她们为基督服务。”^[3]由此,她提出金女大的办学目标是“尽可能地提供有关医学预科研究、教育、宗教方面的专门课程,从而使学生在服务于这有关神职的三个领域时,身体、心智及精神能适应其需要”,希望“大学里全方位的训练对志愿成为中国基督教徒领袖的年轻妇女来说是一种完美的准备”,从而引导她们“把生命全部奉献给耶稣和他的王国”。^[4]根据这一办学目标,德本康夫人对金女大的校训“厚生”作了诠释:“厚生就是在各方面得到至善至美的发展。在多项发展中,学生人格的塑造,基督生命的培育最为重要。获取丰盛生命的学生才懂得给人类社会多作贡献。”^[5]至此,德本康夫人为学校的未来发展方向作出了明确的规划。

为实现这一目标,发扬金女大“厚生”精神,德本康夫人凭借其在美国多年的工作经历,与美国教会大学密切联系,积极筹集经费,为金女大永久校址的建设提供了可贵的经济支持。1916年,在德本康夫人努力下,美国史密斯女子学院(Smith College)与金女大结为姐妹学校,为金女大捐献经费以支持其发展,并于1923年成立“支援金陵女子大学校友会”,每年捐赠经费。为解决金女大建立永久校址的基金问题,德本康夫人于1919年借回美国休假之机,花大量时间代表金女大与美国许多城市和院校的团体组织交流,最终于1921年在为亚洲七所女子大学捐款的活动获得六十万美元的建筑经费。除此之外,德本康夫人还为金女大严格选配师资,购置教学设备,充实学校组织机构,并形成具有本校特色的导师制度与姐妹制度。^①从1913年到1928年,金女大由一名初生的婴儿逐渐成长为婀娜的少女,德本康夫人在其成长中投入了巨大心血,为“厚

生”精神的发扬提供了丰厚的经济资本,拓宽了其文化资本的积累途径和资源。同时,又使得学校在办学过程中围绕“厚生”精神形成自己独特的办学风格,逐渐赢得国外教会团体与社会团体的认可与支持,扩展外部网络,获得了更多的社会资本。

1927年,金女大校董会改组,选举吴贻芳女士为新任校长。吴贻芳是金女大首届毕业生,也是中国第一批在国内取得学士学位的女大学毕业生,后留学于美国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并取得生物学博士学位。渊博的学识与得体的礼仪教养使她得到校董会的认可,而其出色的治校能力也最终赢得了德本康夫人的肯定:“凡是熟识吴博士的人都会意识到,金陵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她在最为困难的时期富有能力的忠实的领导。她的兼顾各方的判断,她对于金陵在完全被战争打乱了正常生活时亦能找到继续其事业道路的坚定信念,她在制定新的必要的调整细节时所表现的耐心,是学校精神得以保存的基本因素。”^[5]在吴贻芳担任校长期间,她继承德本康夫人所倡导的“厚生”校训,并根据当时的国情所需,融入自己的理解,使之内化为金女大精神。她曾对校训作过这样的注解:“人生的目的,不光是为自己活着,而是要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来帮助他人和社会,这样不但有益于别人,自己的生命也因之而更丰满。”^[6]在注解中,她对德本康夫人所讲的基督人格是赞同和理解的,并取其精华,以服务人群为价值取向,将基督教育中的高尚人格和服务精神转化为培养中国新时代妇女的品格训练。她曾在就职致辞中讲道:“本校开办的目的,是应光复后时势的需要,造就女界领袖,为社会之用。学校于国学科学,同时并重,既培养了学者思想,又能得科学家的方法,然后到社会上去,才能应各种的新需要,运用自己所学,贡献给各种新工作。”^[7]由此可看出,她更倾向于把金女大发展成为国家培养急需妇女人才的场所,造就献身于国家、献身于民族的中国妇女领袖人才,而非作为训练基督教徒妇女领袖、以促进中国基督教化的传道场。

与德本康夫人的办学理念不同,吴贻芳对学校的办学宗旨进行了调整,淡化宗教目的,注重学问和道德,养成学生服务社会的本领。为此,她不断完

① 金陵女大的姐妹制度包括校外姐妹制度和校内姐妹制度。校外姐妹制度即金女大与美国史密斯女子学院(Smith College)结为姐妹学校,两校间相互交流与支持,并肩发展;校内姐妹制度指一个三年级班级与一个一年级班级结为姐妹班,每位三年级学生认领一个一年级新生,住同一宿舍,帮助新生较快地融入校园生活。

善教育教学管理,调整系科设置。金女大在初创时期只分文理,且重视宗教教育在各科的渗透。吴贻芳担任校长后取消了宗教系、哲学系、经济系等,并考虑当时社会建设所需以及女性特点,增设地理系、家政系、护预科等,并在社会学系、家政系增设儿童福利专业。通过长期努力,金女大逐渐完善系科体系,形成了自己较有影响的特色系科,如文科的社会学系,理科的家政系及体育专业等。此外,她还颁布《学生手册》,完善学籍管理、课程管理、学位管理,开展多种社会实践活动,使学生在增长知识的同时,深刻领会“厚生”精神,并将其融入社会实践之中,把自身所学奉献给祖国。在其治校23年间,金女大师生不断凝聚自身力量,使鲜明的办学特色制度化,积累了丰厚的文化资本,并成功地将其转化为社会资本,为金女大在海内外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增强了其在教育场域中争夺优势位置的实力,主导了中国近代女子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

二、金陵女大的客体文化资本

客体文化资本具有物质性的一面,因此它必须依附于一定的客观物质而存在。但是,它本身的真正价值并不会通过客观物质自动实现。只有在被个体(或组织)占有,并经个体(或组织)对文化要素充分吸收进而发挥出它本身所蕴含的象征性权利时,客体文化资本的价值才会被真正实现,才能作为一种有效的资本获取一定比例的物质利润或象征利润。这就使得客体文化资本与具体文化资本建立一定的联系,正如布迪厄所说:“在客观化状态中文化资本会呈现出一些特征,这些特征只有放在与具体化形式的文化资本的关系中才能被定义。”^{[21]98}

在金女大的创建与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大量客体文化资本,其中最为典型的当属金女大的校刊。之所以这样说,不仅是因为它作为有形的、体现金女大风貌的文化书籍保存至今,更因为它融入了金女大师生的共同参与,凝聚了金女大的办学精神,为金女大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象征利润。金女大于1924年创办校刊,初名为《金陵学刊》,后更名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刊》,1948年停刊。它对金女大“培养女界领袖”的办学目标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主要体现为四个方面。一是拓展女性视野,增强思辨能力。校刊中设有论说一栏。在这里,学生们思想活跃,自由发表政治见解,评论国内外时事。如笔名飞碧的学生对当时的女子参政运动进行了剖析,认

为“凡一种运动之产生,必有其理论上之根据,实际上之要求。至于运动的成败则必视运动者的实力如何,以及运动时所取的方向和步骤如何。”面对当时女子参政理论依据和现实要求“已有定论、不容置疑”,但“女子参政的实力似乎是等于零”的现状,作者呼吁女性同胞“其各兴起,勉励造就”,积极培植理想的领袖和觉醒的群众,并对女子参政运动的方向与步骤提出意见。^[8]全文逻辑清晰、条理分明,层层递进、发人深省,铿锵有力的字句处处流露着作者对女子参政的支持与期盼。二是进行理论探讨,实现知识升华。校刊中时常刊有学生对教育教学理论与方法的探讨。如名为朱激的作者对中学历史教学方法进行梳理,提出教师八项教学计划以及五种课堂教学方法等,力求完善教师的应变才能、技术运用,为中学历史教学实践提供理论指导。^[9]诸如此类的文章还有很多,学生们在撰写文章的过程中完善了知识体系,提升了学术研究能力,积累了“女界领袖”所应有的学术素养。三是记录校园活动,总结实践经验。校刊还刊登了金女大师生的各种实践活动。如在《培幼小学校之经过及现状》一文中,作者对培幼小学校的创办经过及现状进行记载,通过“回思往昔”,感激“开山始祖创设之劳,以及前各同学协力维持之力”,在总结中“协力谋该校之进行与发展”。^[10]学生们在文字梳理的过程中实现了实践向理论的转化,提升了其发现问题的能力。四是丰富文化生活,陶冶女性情操。校刊中还有诗、散文、短剧等,体现了细腻的女性思想感情,丰富了学生的精神生活,同时也反映了新时期女性的思想转变。如在小说《世香女郎恨史》中,作者刻画了一位“慧敏过人”的女校学生王世香,她由于父母羡慕章家多金而被迫嫁给了“粗眉黑脸、性又粗蠢”的章宗生,不幸的婚姻生活最终酿成了其投湖自尽的悲剧。^[11]文章表达了作者对吃人的封建礼教的痛恨以及对婚姻自主的向往与追求,体现了其冲破传统世俗观念、争做新时代女性的决心。由于时局动荡,校刊经历了停刊、复刊、改刊等波折,但它还是顽强地陪伴着金女大度过其最困难也是最辉煌的时光,凝聚学校内部力量,将金女大师生团结在一起。

如果说校刊体现了金女大“培养女界领袖”的办学目标,那么乡村服务处则是金女大“厚生”精神的现实诠释。乡村服务处是金女大在战火中审时度势,为服务国家需要,适应战争环境,于1939年在成都仁寿县开设的。服务处工作人员多为在校或毕

业学生,内设妇婴组、幼儿教育组、挑花组、鸡种改良组等,为当地妇孺提供医疗服务,组织适龄幼儿接受免费教育。另外还开设妇女班,帮助妇女提高知识水平,增强谋生能力。金女大回宁复建后,停办了成都的乡村服务处,在南京成立了淳化镇乡村服务处。在那里,她们继续开设妇女班,对妇女进行国民训练,举办农忙托儿所,发展幼儿教育;多次向当地居民发放冬衣,为儿童提供淡奶、奶粉、鱼肝油等。乡村服务处的开设使金女大将牺牲奉献精神付诸行动,使学生在为国家服务的过程中把“厚生”精神融入社会,在参与服务活动当中建立慈善人格,让生命变得更为充盈。同时,金女大面向社会的服 务活动也为她赢得了来自社会各界对“厚生”精神的认可与赞誉,从而扩大了社会影响力,提升了学校在 教育场域中的社会地位,获得了象征利润。

三、金陵女大的体制文化资本

体制文化资本采取学术资格的形式,对蕴藏于个体(或组织)之中具体的文化资本加以区分,并以制度的形式加以规范。这种方法抵消了文化资本被具体化后形成的与其承担者相同的生物限制,使资格拥有者之间的比较与替代成为可能,为其在场域中的公平竞争提供一种凭证。它的作用在于通过这种制度性的学术资格的认可,以及其拥有者之间的比较,赋予拥有者一种文化的、约定俗成的、经久不变的、有合法保障的价值,从而使其获得具有一定权威和影响力的社会认可,最终达到争夺或维持场域中优势位置、主导场域发展方向的目的。

金女大最为显著的体制文化资本在于它所拥有的女子大学头衔,而非当时中国社会普遍意义上的、被男性所掌控的大学。(1)女子大学是在中国当时男子掌控高等教育、女性追求高等教育平等的前提下形成的一种女子高等教育机构。它的招生对象仅限于女性,目的是提高女性素质,培养现代知识女性。女子大学开启了中国近代女子高等教育的进程,丰富了中国高等教育制度的内涵,对妇女解放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是中国从男权教育过渡到男女同校教育的纽带。金女大作为“中国第一所女子本科高等教育学府”^[12],为社会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高级女性知识人才,孕育出第一批在国内取得学士学位的女大学毕业生,对改变当时中国女性的生存状态有重大意义。(2)这种体制文化资本还使金女大获得了更多的经济资助。金女大作为一所教

会创办的女子大学,为实现在中国培养基督徒妇女领袖的目的,教会给金女大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支持,一直持续到1950年。^{[12]138}同时,它又作为一所中国人自己管理的、引领中国女子高等教育发展的大学,符合国民政府发展女性教育、提高女性素质的要求,故而得到了国民政府的大力支持。如1943年,金女大获国民政府教育部补助费九万元,另四川省教育部补助金女大家政系三千元等。^{[12]128}金女大在充足的物质资本支持下,全身心地投入到女子高等教育之中,在教育场域中积累了雄厚的学术实力。(3)金女大先进的办学理念和突出的学科特色使其赢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可。1933年,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准许金女大有权自行颁发学位证书,这意味着金女大的教育水平得到了国外学术组织的认可。国民政府教育部也于1941年为金女大十一位教员颁发奖状,以资奖励,并于1943年、1944年为金女大久任教员发放奖金。^{[12]126-129}此外,随着社会影响力日渐扩大,金女大成为越来越多追求妇女解放的中国女性梦寐以求的学府。

通过以上表述,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体制文化资本给金女大带来的社会权威和影响力。在这种文化资本的驱动下,金女大逐渐凝聚学术实力,取得优质学术资格,在教育场域中争得独特的位置,成为中国近代女子高等教育机构的典型代表。

四、启示与借鉴

金女大在创建与发展过程中,经过自身努力积累了鲜明的具体文化资本和大量的客体文化资本,以及别具特色的体制文化资本,这些不同的文化资本共同造就了她辉煌的历史。这对我国当下高校的建设与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与借鉴意义。

首先,具体文化资本的积累要求我们正确处理传统与外来的关系。金女大在中西文化碰撞中形成,两位校长切合实际的办学理念使得她在风雨飘摇的岁月里安然成长,并赢得海内外赞誉。其中,德本康夫人的办学理念及她为此付出的努力让金女大走出国门,吸收外来文化,开阔眼界,拓展了外部网络。而吴贻芳校长的办学理念则更贴合当时国情,充分考虑本土环境所需,深入分析外来文化之根本,借鉴德本康夫人办学理念之精华,使其融入中国文化土壤,丰富了中国文化内涵,形成了鲜明的办学特色,引领着金女大牢牢占据教育场域中的优势位置。这对当下大学国际化进程中,我国大学

校长面对纷至沓来的西方文化与思想,如何处理外来影响与已有传统之间的关系,形成既立足本土又放眼世界的办学理念,提供了现实的借鉴范例。

其次,客体文化资本的积累要求我们在办学理念指导下开发有特色的文化产品。无论是保存至今的校刊,还是闻名于当时的乡村服务处,金女大的文化产品处处体现着金陵师生对“厚生”精神的解读,紧紧围绕着学校的办学宗旨与理念,这使得金女大客体文化资本别具一格。反观当下,各高校盲目鼓励学生参与社会实践和组织各种社团,却多流于形式上的“创新”,疏于指导,缺乏内在思想,与学校的办学宗旨、理念相脱节,没有形成独特的文化产品。面对这种现象,我国高校可借鉴金女大的经验,围绕本校办学宗旨,生产出真正体现本校特

色的文化产品,打破“千校一面”的状态。

最后,体制文化资本的获得使我们明确了重提女子大学的必要性。目前我国男女同校的高校教育模式遮蔽了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特点。而在西方,女子大学仍然焕发着夺目的生机,譬如“七姐妹”大学是美国著名的七所女子大学的总称,其显著的声誉甚至可与“常春藤”八校分庭抗礼。正如潘懋元先生所说:“女子教育,尤其是女子高等教育,是社会文化现代化变迁的寒暑表。”^[13]在经济全球化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今天,随着就业空间的扩大,社会对女性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加之女性在受教育过程中表现出的独特性,使得重提女子大学发展、提升女子大学地位在当下仍然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 [1] 王红岩.金陵女子大学人才培养特色评述[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9,(6).
- [2] 布尔迪厄·P.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M].包亚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 [3] 程斯辉,孙海英.厚生务实,巾帼楷模——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
- [4] Mrs. Lawrence Thurston, Miss Ruth M. Chester.Ginling College[M]. New York: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 1955.
- [5] 朱峰.基督教与近代中国女子高等教育——金陵女大与华南女大比较研究[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
- [6] 吴贻芳.金女大四十年[A].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Z].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
- [7] 吴贻芳.就职致辞[J].金陵女子大学校刊,1928,(11).
- [8] 飞碧.女子参政运动的商榷[J].金陵女子大学校刊,1925,(3).
- [9] 朱漱.中学历史教学法[J].金陵女子大学校刊,1925,(3).
- [10] 裕生.培幼小学之经过及现状[J].金陵女子大学校刊,1924,(2).
- [11] 南雷.世香女郎恨史[J].金陵女子大学校刊,1925,(5).
- [12] 孙海英.金陵百屋房——金陵女子大学[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
- [13] 潘懋元.女子高等教育——文化变迁的寒暑表[J].集美大学学报,2001,(9).

责任编辑 张艳玲

A Cultural Capital Perspective on Ginling College

REN Xinxing

Abstract: As a Christian women's university, Ginling College initiated modern Chinese women's higher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ourdieu cultural capital theory, this paper analyzes Ginling College's cultural capital in the embodied, objectified and institutionalized state, and finds that culture capital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Ginling College. A study of Ginling College's cultural capital might be useful in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dition and exoticism in the university.

Key words: Ginling College; embodied cultural capital; objectified cultural capital; institutionalized cultural capital